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中☒民族的☒☒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09-04-28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 ☒开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2290

论中华民族的结构

陈 连开*

传统的说法，世界有四大文明古国；按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教授的研究，世界独立起源的文明有六处。上述这些文明古国或独立起源的文明，延续至今而文化传统从未被隔断的只有中华文明。世界古典的古代与中世纪，曾兴起为数不少的庞大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军事力量分裂或崩溃以后，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再也无力恢复其往日的统一。然而被西方称为“中华帝国”的中国，数千年来由众多民族形成统一的国家，期间虽有二度大分裂演化为南北分别由汉人和北方民族建立王朝对峙，却都在大分裂与南北朝对峙之后，达到更高度的统一，终于确立为巩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多次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同时使尽了各种分裂中国的阴谋，尤其在中国民族问题上阴谋层出不穷，也泡制了形形色色旨在制造中国分裂的“理论”。但中国各民族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在最艰苦的历史条件下，战胜了帝国主义，保卫了祖国的统一，获得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最近20年来，世界上民族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有些非常强大和相当发达的国家因此成为分裂和战争的导火线，而中国民族团结，政局稳定，在现代化基础上争取中华民族的繁荣，正鼓舞中国各民族共同奋斗。

上述这些事实，都激发我们去认真探索中国民族结构的奥秘，去寻求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费孝通教授，曾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作过“多元一体格局”的高层次概括，已成为研究中华民族的核心观点。作为费老的学生，本人希望以此为核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作较为系统的叙述与论证，近期将出版《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一书，借此机会，就中华民族的结构略呈鄙见，希望专家们不吝指教。

一 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

虽然中国历代王朝的封疆范围时有不同，但当代中国各民族及其先民创造历史与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是比较明确而稳定的，这个空间范围，我们称之为中华大地。

中华大地得天独厚，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结构，创造了独具特点的历史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

中华大地第一个地理特点是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人们大都相信中国四外环海，内部由中原和四夷共同构成“天下”，故天下又称为“四海之内”。虽然中西交通在陆上与海上都有一定规模的发达，

* 中央民族大学

对中华大地之外，秦汉以来有了不少了解，但仍基本上是在传统的“四海”范围以内多民族内向汇聚，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

中华大地地理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自西向东构成三个差落显著的阶梯。西部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其以东以北和东南，有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及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等浩瀚高原与巨大盆地相间分布，平均海拔降到2000—1000米以下，是第二阶梯。第三阶梯，包括北起大兴安岭、中经太行山、南至巫山一线以东及云贵高原东缘以东地区，平均海拔低于500米，多为丘陵，仅少数山峰高达2000米左右；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等大平原，是第三阶梯最低平的地带，尤其滨海地带，低于海拔50米。

如此落差显著的三大阶梯，像把巨大无比的大躺椅，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朝太平洋，有近2万公里的海岸线。季风气候显著，加上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形成多种多样的气候。以雨量而言，东部低阶梯湿润多雨，中部第二阶梯，除云贵高原外，一般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尤其西北内陆，距海数千里之遥，加之重重山岭阻隔，东南方从太平洋、西南方自印度洋吹来的温暖夏季风鞭长莫及，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青藏高原则以高寒为特点，自成气候大区。

中华大地东西跨60个经度以上，内陆气候以距海远近而形成湿润、半干旱、干旱的自东南向西北的明显递变，南北跨30多个纬度，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从南向北递变。大体言之，台南、琼西及滇南河谷一线以南为热带；此线以北至秦岭、淮河及白龙江一线以南为湿润多雨的亚热带；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即辽东、河套、陇西一线以南为暖温带；秦长城以北以西为中温带；黑龙江大兴安岭北端为寒温带。新石器文化遗存及古代文献记载的物候与气象记录表明，亚热带与暖温带的分界在过去几千年间有过较大的推移，比如黄河中下游在新石器时代和商周，均较现代暖和得多。但总体上自北向南平均气温递增的规律并没有多大改变。

这种南北气温递减、东西雨量递减的气候，把中国明显划分为人口与经济分布均成鲜明对比的东西两个大部，即北起黑龙江省爱辉（黑河），沿大兴安岭南下，中经陇山，南至邛崃山，终至云南腾冲一线，以东为中国的东部，农业发达，人口集中，地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0%，人口占全国总数却自古至今保持着高达90%以上；自唐宋至明清的千余年间，东部人口占全国总数经常高达95%以上。上述一线以西为中国的西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60%，主要是草原游牧区，穿插分布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人口占全国总数通常在10%以下。然而，河西走廊和天山以南是连接中华大地与中亚、西亚以及南亚的咽喉和枢纽，中国西部并不因为地广人稀，减少其在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受前面两大特点制约，中华大地地理环境的第三个特点是农业区与牧区及农耕民

族与游牧民族发展带分野清楚，而又天然地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同时也表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社会发展的显著不平衡。大致是：秦岭—淮河以南，是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民族分布之区；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是农业起源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汉族起源与早期发展以旱地农业为主，春秋战国楚与吴、越、巴、蜀华化，以及自东汉以来多次南迁，于是在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的中游、下游及淮河流域，汉人成为兼容旱地与水田农耕的农业民族。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森林狩猎区，是游牧民族和狩猎、渔猎民族分布发展的区域。

中国经济的多元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全国生产部类多样而各个区域相对单一，形成了各区域各民族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尤其是广大游牧区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既形成了农牧经济的共生互补，又形成了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经济上的需求和依赖大于农业民族对游牧民族的需求和依赖。

机器制造工业兴起以前，农业生产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汉族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民族，其精耕细作与农业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科学与集约化现代化农业生产形成以前，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其统治民族是汉人还是北方少数民族，没有一个不是建立在广大汉地个体农业的基础上。汉地农业生产被破坏，王朝的经济基础即被削弱；汉地的统一被破坏，国家就会分裂；中原混战不息，生产凋敝，边疆就会出现众汗诸王纷起的局面。

中华民族以农业为基础立国，并非草原牧区的经济无关宏旨。中国是一个拥有广大草原的国家。

从自然地理角度观察，在欧亚大陆中部有一条带状分布的大草原，西起欧洲多瑙河下游，经东欧草原地带一直伸展到中国的东北，绵延21000多公里，称为“欧亚草原带”。中国广大的草原，位于这个草原带的最东端。其地域横亘于北纬30°—50°之间，蜿蜒万里，整个草原地带属于中国的西部。从人文地理和民族关系角度观察，辽阔的中国草原上曾兴起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强大的民族。他们的历史舞台往往超出中国的范围，成为中国以外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其主要发展方向仍是中华民族结构中的内向汇聚。在中国古代，农牧民族的矛盾与对立，是中国历代王朝民族问题的主要侧重面。秦、汉、明三个汉人建立的强大王朝及北魏、北齐、北周三个由汉化鲜卑人与鲜卑化汉人建立的王朝，都在北方郡县沿边修筑万里长城。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万里长城是处理农牧民族问题的防御战略的实施，是利用强大中央集权国家力量修筑的防御工程。从农牧民族发展的客观实际看，它一方面是把农牧民族分隔开来，对郡县农耕区起了一定保护作用的防御工程，另一方面又在沿长城一带进行农牧产品交换与文化交流，形成了自辽东、辽西至西域沿长城分布的一系列以农牧交换为其特点的城镇，所以又是把农牧民族连接起来的宏伟漫长的纽带。

这种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的作用，是农牧两大类型民族极其经济、文化既相矛盾又不可分割生动而深刻的反映。世界上唯独中国有这种特点，也只有中国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才有力量修筑这种被世界称为伟大奇观的万里长城¹⁾。

万里长城在民族关系方面无需起战略防御作用，因而也没有为民族问题而大兴土木修葺长城的大统一王朝有汉人建立的唐朝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及满洲人建立的清朝。这些朝代都在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其州县区域跨长城两边，对中国疆域的发展与农牧民族的结合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万里长城在中华民族内部关系上的战略防御作用完全消失了，已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屈不挠精神与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象征。当前，长城内外的各民族，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传统那种农牧经济模式及民族分布格局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在长城南北都建立了现代化工业体系。草原牧区畜牧业的现代化，在现代中国经济体系中已构成中国大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最重要的畜产品和牛羊肉食基地。

中国地区广大，气候、地形多样，农业区除汉族以外，中南、西南农耕经济与长江、黄河中下游有较大区别。季节风气候对中国农业生产至关重要，也往往带来水旱灾害。各个地区农业的产品也有不同程度的互补和互相依赖，而且各地开发过程不平衡，经济文化重心随时而移。从总体上看，在现代工业和商业兴起以前，中国的东部较西部发达，尤其是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农业发达区域的农业是中华民族古代发展的主要基础。唐中晚叶以前淮河流域以北较长江、珠江流域发达，晚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沟通南北地区交流的需要，使中国从春秋时期已开始至元朝完全修通南起杭州北达大都（今北京）的南北大运河。在南北铁路开通以前，运河一直起着北南交通大动脉的作用，沿运河形成了一系列商业都会。南北大运河，是可以和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中国古代独特的人造地理景观。

现代工业和商业兴起，尤其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开始以来，形成了沿海利于开放的地带为东部；长江、黄河中游古代经济最重要区域为中部；其他省区为西部的发展新格局。

总之，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已表明，中国南北三大区域民族的交替作用，农牧两大类型经济和文化的共生与互补、矛盾与交融，和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1) 不能把一切出于防御目的的长城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春秋战国时诸侯间的长城的消亡，意味着华夏诸侯兼并的结束与民族的统一，与北边万里长城为农牧民族关系的产物，性质仍有所区别。罗马帝国在英格兰修筑的长城有117公里，维持了3个多世纪，是欧洲历史上可以与中国万里长城相似的防御的工程。但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民族迥异，这一工程随罗马帝国灭亡共同消失，与中国万里长城横亘万里贯通古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内在联系客观条件之所在。在现代化进程中，东部优先发展，并推动东、中、西部协作，共同发展，各民族共同繁荣，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和进一步一体化必然的发展趋势。

二 中华民族的民族结构

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作“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²⁾。汇聚融合的结果，很早就形成了华夏/汉族，是中华民族结合凝聚的主干和核心³⁾。

作为族称，华夏是汉族的前身，汉族是华夏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同一民族前后不同阶段的直接延续，用华夏/汉族进行表述比较明晰。他是中国远古各部落集群融合的产物，又在数千年中，不断涵化吸收其他民族成分及其文化而发展壮大，始终表现出不断汇聚、融合和涵化、吸收的特点。

除了华夏/汉族以外，中国古今都有众多的少数民族。未经认真的统计，仅据一些文献记载推论，历史上华夏/汉族以外各民族的人口与华夏/汉族比较，相差不像当代那样悬殊。但自秦汉以来，中国各民族以汉族人口最多并且构成当时全国人口的多数（在边疆民族地区各不同历史时期汉人数量不同，在清朝前半期以前，边疆的汉人在当地大致上多是居民的少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当代中国各民族中，回族是以元代东来的中亚、伊朗、阿拉伯诸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成分为主，也包括唐、宋以来久居中国的阿拉伯、伊朗等处的穆斯林商人，并且吸收涵化了汉、蒙古、党项等许多民族成分，在中国土地上形成的中国民族。他们来源的民族成分如此复杂，并且全国分散，生活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却形成了同一个民族，共同信奉伊斯兰教起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有以邻国朝鲜移民于中国东北形成的中国朝鲜族；以俄罗斯移民形成的中国俄罗斯族。京族的先民，从邻国越南移居中国，他们是在16世纪初从越南涂山等地漂流到沔尾、巫头、山心三个中国的小岛（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县），在中国已生活了400多年，形成了中国的京族。除以上几个少数民族以外，其他中国各民族，均起源于中华大地，是在中华大地上经过漫长历史年代繁衍生息，形成发展的民族。

中国古今各民族，依据其起源、语言系属、经济特点、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分布等因素分为若干族系。这种族系划分由于各家学术见解与对中国民族史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今以语言系属为基干，参照其他因素作个简述，希望有助于对中华民族民族结构的了解。

2) 参见 [陈 1989, 1994]。

3) 参见 [费 1989]。

从历史上看，秦长城以北（辽东、辽西均属长城以内），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起源之区和活动的广阔天地。最东北是肃慎（先秦）—挹娄（两汉魏晋）—勿吉（南北朝）—靺鞨（隋唐）—女真（辽、金、元、明）族系各部落或民族起源、发展、分布之区。部落众多，各有族姓名称，其中曾出现勃海、女真完颜部和满洲等强族，或以牡丹江流域为中心建立东北边疆王朝（勃海国），或统治中国北部（金朝），或统一全中国（清朝）。由于他们传统的生产和生活，骑射居先，在整个民族的文化与习俗中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通常误称他们为“游牧民族”。实际上他们都是以狩猎、渔猎为主，农业也有所发展，依山结屯族居，从来也不是像匈奴、突厥那样以牧为主，定期在本部落冬夏牧场上游牧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具有游牧民族骑射为上，社会组织一直保持部落形式等特点，有传统的萨满教信仰，也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相通。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当代中国的满、赫哲、鄂伦春、鄂温克均属这一族系的苗裔。除满族的发展与汉族相同，其他3族直到本世纪50年代以前，都还处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阶段。

在肃慎族系以西，东北大平原中部，历史上曾经是濊貊—夫余族系分布之区。其中夫余是中国东北平原农业发达较早并在西汉以前已出现王权的一族。夫余王臣属于汉朝，享受诸侯王的礼遇。公元483年被其同族系的高句骊所灭，493年勿吉人逐其残部并据有其地。高句骊为濊貊—夫余族系另一强族，分布于古盐难水（今浑江）及小辽水上游（今苏子河）一带，西汉玄菟郡于其地置高句骊县。公元2世纪始强大，与辽东、玄菟两郡时有争战，对东汉及魏、晋王朝时叛时服。公元5世纪初，趁当时中国分裂，占据辽东、玄菟两郡，并于公元427年迁都平壤，已属邻国。其所踞辽东地区，于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收复，唐于其地建安东都护府。

夫余以西，大兴安岭山原，是东胡族系起源兴起的地区。

东胡之名见于战国，以其居匈奴（胡）之东，中原称之为东胡。秦汉之际，匈奴单于冒顿灭东胡，并其地。至汉武帝时击败匈奴，东胡同族系的乌桓人南迁至东北五郡塞外（今河北北部沿边地区及内蒙古赤峰市、辽宁省西部一带）。东汉时鲜卑始强，包括乌桓、鲜卑在内的东胡族系，起源于大兴安岭山原，氏族、部落众多，以山原游牧为主。乌桓人南迁后，逐渐形成以牧为主，同时与汉人杂处，农业也有所发展。至曹操征乌桓，以其部众编为骑兵，“号为天下名骑”；随着进一步内迁大多汉化。乌桓旧所分布的五郡塞外，由鲜卑人南迁填补。匈奴人削弱以及后来终于西迁以后，鲜卑继续西迁与南迁，成扇形广布于蒙古草原及代北、河西、陇右等地。在中国历史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曾建立一系列王国。其中拓跋部曾建立北魏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淮河以北中国的王朝。

鲜卑分布如此广大，且有慕容、宇文、拓跋等强部，与他们涵化吸收了大量匈奴留居于中国境内的部众分不开，也与他们主动积极吸收汉文化分不开。到隋唐，各部

鲜卑除一部分融入羌、突厥、契丹等族以外，绝大部分已融入汉人当中。乌桓、鲜卑是隋唐时汉人的重要来源之一。

东胡族系于南北朝时期在东北地区北有室韦，南有契丹与奚；而柔然雄强于蒙古草原，势力远达西域，族属与鲜卑相近。

室韦诸部与鲜卑有直接的渊源联系。隋唐时，突厥强大，前后突厥汗国都曾在室韦地区设立吐屯，而唐朝也曾设立室韦都督府。公元9世纪中，回纥汗国灭亡并西迁以后，室韦诸部西迁至蒙古草原，出现了许多与室韦渊源相通的部落，其尤为强大的有靺鞨、克烈、蒙兀等部，辽金时臣属辽金，时服时叛。13世纪初叶，以唐代蒙兀室韦西迁形成的蒙古部最强大，统一诸部，形成蒙古族，至13世纪中建立元朝，并于1297年完全统一中国。

契丹人分布在室韦之南以潢水（今西喇木伦河）为中心的地区，游牧为主，唐代于其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奚分布在契丹西南以饶乐水（今老哈河）为中心的地区，半农半牧，唐于其地设置饶乐都督府，均为羁縻府州。至公元10世纪初叶，契丹建立王朝，史称辽朝，曾统治中国长城南北一带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北宋对峙。契丹与奚，在辽朝的一个多世纪，已合而为一，辽亡以后，大多均汉化，元代是汉人的一部分。其中有些仍在牧区从事游牧的部落，已化入蒙古诸部之中。

中国北部的大草原，清代及其以前是中国游牧民族的历史大舞台。战国末叶，匈奴人已兴起于秦、赵两诸侯国之北，公元前209年冒顿自立为单于，建立游牧国家，先后东役属东胡，北统一丁零等部，西逐月氏、乌孙，役属西域诸城邦及游牧各部，以长城为界与西汉对峙。西汉中晚叶臣属汉朝，东汉中叶北单于西迁，而部众留居草原者化入鲜卑。匈奴进入郡县者，逐渐半农半牧，“五十六胡”时期曾建立一系列王国，南北朝时期这一部分匈奴人汉化，是隋唐汉人的重要来源之一。匈奴人的族系，史家历来意见不一，难于定论。现通常归之于与突厥族系渊源相通。

突厥族系的先民为丁零（狄历），先秦已见于记载，匈奴盛时为匈奴所役属，至南北朝称谿敕勒（铁勒、高车）。北朝末叶突厥取代柔然在蒙古草原的统治，延至隋及唐初均号称强大。唐中叶回纥（回鹘）兴起，建立汗国，是继突厥之后的强大游牧汗国。突厥、回纥与隋唐基本同时，并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突厥族系各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中亚、西亚乃至东欧都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这些民族都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其先民与中国突厥语族各民族有渊源相通之处，而民族形成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

当代中国的民族属突厥语族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撒拉、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其形成均经过由多元融成同一民族的过程，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大迁徙，不断涵化吸收了多种来源民族成分与文化因素。这些民族的先民有过共同信奉萨满教的历史，后来有些曾接受摩尼教、佛教、祆教、景教，现在除裕固族仍信奉萨满教又

接受了藏传佛教，其他几个当代中国属突厥语族的民族均信奉伊斯兰教。

新疆古称西域（狭意），因其地是中国与中亚、南亚，进而至西亚、非、欧交通的枢纽，历来都是多民族居住和交往的地区。其土著最早见于记载的西汉时西域三十六国的族系，未能作为明确的判别。依据历史文献所记述古西域诸国人的某些体质特征和考古发现的当地民族古文字，专家们判断其中多属印欧人种，其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或与之较为接近的语言。西域与青藏高原邻近和通道地带各游牧部落，多属于氏羌族系。月氏、乌孙原是分布在祁连山及河西走廊地区的游牧民族，属印欧人种。其中月氏先秦已见于中国文献记载，并且与商、周有一些联系交往。匈奴冒顿、老上单于时先后灭月氏、乌孙，杀其王，逐之西迁。月氏几经迁徙终定居于大夏，建立贵霜王朝；乌孙迁居在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游牧，并与原居其地部分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的游牧人塞种融合，发展成为天山以北势力最大的游牧强族，与汉朝结盟，在打败匈奴单于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很长的历史演变，其中尤其是前后突厥汗国及回鹘人西迁等重要历史进程，西域地区各族大都突厥化。今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的中国民族只有塔克吉族，以牧为主，信奉伊斯兰教。公元840年回鹘人西迁，与世居西域的城邦居民及早已先分布在西域的突厥人及汉人等融合为一体，形成了维吾尔族，以绿洲农业为主，商业也较发达。乌孙人的苗裔则是哈萨克族的来源之一，至今哈萨克人以牧为主。晚唐，西突厥的一支沙陀人内迁至中原，迅速汉化，五代曾建立后唐、后晋、后汉3个王朝和北汉王国。至北宋统一，这些东来的沙陀人大部分汉化。一部分迁到塞北的沙陀人，则是辽金时汪古部的重要来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诸部，汪古部成为蒙古诸部中的一部。

氏分布在陇山以西，今甘肃、青海、川西北一带诸部，统称氏羌，自成一族系。

虽与羌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实其起源与分布，在今陇南、天水地区及陕甘接壤的陇东地区和川西北嘉陵江上游与白龙江一带，是在这些地区的河谷与山间平坝从事农耕为主，畜牧业占有较重要地位的诸部。他们地域与甘青川西北羌人相接或在氏人分布区内与羌人杂处，但与羌人以游牧为主有着显著的不同。

氏羌的起源与炎黄部落集群有密切的渊源。炎黄部落东进与黄河下游泰山以北以西的两皞集群诸部落融合，形成了夏、商、周三族的先民；其西进至黄河上游及岷山等地区诸部则是氏羌族系的先民。战国时期，羌人在甘青草原渐强，部落林立，不相统一，但也形成了一些雄强部落，西汉时成为甘青草原上的主要游牧部落集群，东汉时曾是西北主要劲敌。

陇山两侧战国时西戎氏羌诸部大多被秦兼并而华化，而秦汉时在陇东、陇南、川西北仍有诸氏分布。东汉、魏晋时，氏人、羌人都有相当多的部落内迁，至东晋在关中已形成与汉人人数相当的局面。其仍居原处游牧的诸羌人部落，东汉时称为西羌。

“五胡十六国”时期，氐人建立了几个王国，其中前秦苻坚曾短时间统一黄河流域。东进的羌人也建立了后秦。这些进至郡县地区的氐羌部落，至隋唐大都已经汉化，是隋唐时汉人的重要来源之一。

东晋时，鲜卑吐谷浑部西迁，在甘青地区发展，建立吐谷浑汗国，其统治下的民众则主要是羌人。羌人强部在魏晋南北朝见于记载则有党项、白兰等部。至唐中叶，吐蕃东进，灭吐谷浑，唐迁吐谷浑、党项等部于西北郡县安置。吐谷浑人内迁不断分散，或汉化，或化入其他民族之中。党项人则经过两三个世纪在西北的积累，1038年元昊建立西夏，至1227年西夏灭于成吉思汗。西夏灭亡以后，党项人分散，分别化入不同民族之中。仍居甘、青、川西北的羌人诸部则经过与吐蕃长期融合，成为甘、青、川藏族的主要来源。

羌人的先民及羌人诸部南下，在川西及云贵高原发展的过程，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秦汉以来不断继续，《史记》将这些部落统置于“西南夷”当中。实两汉时西南夷，大体包括氐羌族系、百越族系和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闽濮等族。今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云贵川各民族，大体都是以南下诸羌为核心融合多种成分形成的民族。当代中国民族中仍有羌族，以农业为主兼事畜牧，其分布地区属古羌人分布之区。历史上的氐人分布区内也还有少部分居民保持氐人遗裔的意识，其风俗习惯也颇有古氐人遗风。

西藏高原上发现的旧石器与新石器文化，说明西藏民族起源同样具有本土与多元的特点，其文化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上游文化有相通的渊源。在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千余年间，西藏也是部落众多，又逐渐形成了象雄（羊同）、孙波（苏毗）、博（雅隆）3大部。象雄以牧为主，农牧结合；孙波为古羌人的一部，分布在藏北高原一带，是游牧部落；博人在雅隆河谷以农业为主，至隋唐之际兴起，统一诸部。7世纪初叶，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经过几代人在统一西藏的基础上东进，并甘、青、川的诸羌，也包括少量吐谷浑人、汉人、回鹘人等，融合形成了藏族。有些著作将藏与羌合而称为羌—藏族系，是合理的划分。为了将藏族的起源及其融合过程中各种不同来源给读者以清晰的印象，在此分别加以叙述。

在中南与东南，最大的两个族系是百越和苗瑶。另有百濮，起源于江汉地区，或已融入楚人、巴人之中而华化；或已南下，与百越、氐羌部族杂居，部众分散，分别化入不同诸族。在汉代西南夷中有哀牢所属闽濮、爨濮等，隋唐时有濮子蛮（朴子蛮），或其中也可能融合了南下的江汉百濮苗裔。现有些论著将南亚语系的濮子蛮及其苗裔：今之佤、德昂、布朗3族列入“百濮”族系。然而先秦百濮与两汉闽濮、爨濮及唐代濮子蛮仅族称有同音“濮”字，起源地域大不相同，很难说是属于同一族系。

苗瑶族系先民，是三苗的一部分，汉代有长沙—武陵蛮，是今日中国民族苗、瑶、畲的先民，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汉代以“蛮”为族号者还有一定数量的部别。

其族系当与这一族系有一定联系，其苗裔则大多已经汉化，或成为其他少数民族的来源。

百越在长江下游及岭南、云贵乃至中南半岛广泛分布。其中在长江下游兴起吴、越，春秋晚叶曾争霸于中原，至战国已经华化。秦汉时百越分为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诸部分，南北朝隋唐时又有俚、僚（佬）等泛称，中国今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是百越族系的苗裔，分布在岭南及云贵广大地区。

台湾现在也是以汉人占居民多数的多民族杂居省分，其原住民，是有不同族称，语言差别也比较大的几个部别（一般认为是9族），现在统称为高山族。他们的来源与中国东南的远古居民有密切的渊源，有些部落说南岛语系语言，可能与其他说南岛语系语言的民族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目前，台湾学术界，其中包括高山族的学者，越来越重视对高山族历史与文化的调查研究，将会以新的研究成果充实对高山族历史的认识。

从以上中国各族系诸族的起源、分布、经济、文化及族体形成与演变等基本情况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方式作矛盾统一的运动。各兄弟民族间，农牧分区明显而又互相依存互为补充；语言族属复杂，而又在全国范围内共同使用汉文作交际工具；各有自身形成发展的历史而又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在数千年发展中，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斗争、混杂、融合，同时也有分化和消亡，形成了一个由众多民族你来我去，此兴彼替，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既各具个性，又具有多层次共同性的统一体。

三 中华民族的政治结构

任何民族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结构组成民族，其最高形式就是国家。中华民族当代的最高政治结构，是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随后澳门回归祖国，将完全消除殖民统治的遗留，创造一国两制的模式并最终导致整个中国的完全统一。

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所经历的数千年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由众多分散孤立的民族单位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统一多民族中国在古代形成发展过程中，以秦汉为开端，三国两晋和南北朝经历了分裂和南北王朝对峙的考验，隋唐达到了重新统一和空前的繁荣。五代十国再次分裂，辽宋金再度形成南北王朝对峙，到元明清进入确立的时期。这个历史进程表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确立是以统一（秦汉）→分裂后逐步形成南北朝对峙（三国、两晋、南北朝）→重新达到更高度统一与繁荣（隋唐）→再度分裂和南北朝对峙（五代十国辽宋金）→巩固和确立（元明清）这样的形式螺旋式发展的。

中国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原因很多，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国

由多民族形成统一的国家，华夏／汉族起了主干作用，其他各民族也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种各民族以凝聚结合的方式缔造成功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与世界古代及中世纪的大帝国以及近代殖民地大帝国都有显著的不同。

中国如此广大的疆域，是中国各民族的先民共同开发的。这一点从中国各民族起源、分布、迁徙的事实中足以得到说明。中国的统一也是以如下的方式逐渐扩大和巩固的，即：各族局部性的统一→较大的地区性多民族统一→全国性的统一。分裂了以后，重新以上述形式凝聚结合，从而谱写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的历史。以下从几个主要方面叙述其梗概。

(一) 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民族以华夏／汉族为主，也有其他少数民族；中国的疆域和统一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

从夏、商、周到西晋（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316年）的2500年间，华夏／汉族一直是统治民族，其自身也处在从民族雏形不断发展壮大和形成的历史进程当中。

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政权，从而揭开了少数民族逐鹿中原的序幕。自公元317年开始，正式开始了汉人在中国南部，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国北部以不同王朝对峙的历史。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结束，589年南北完全统一。

隋唐是汉人为统治民族的统一时期。五代当中的后唐、后晋、后汉3个朝代是沙陀人建立的，十国中有沙陀人建立的北汉。

辽宋金夏时期，契丹人建立辽朝，女真人建立金朝，党项人建立西夏，汉人建立两宋，都是对中国历史有重要影响的王朝。

元、明、清时期，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明朝是汉人建立的，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元和清两朝，实现了整个中国的大统一。

在边疆，不同时期也有过许多由当地民族建立的国家，对当地的多民族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是构成中国大统一的地区基础，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今日中国的疆域，是对所有中原与边疆各王朝、汗国、王国疆域的继承，也是历史上所有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建立政权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无论在当时这些政权之间以何种关系同时存在，其历史发展的结局都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 在数千年中，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中国，是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国众多的民族，自然存在民族矛盾，在剥削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古代，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民族歧视。民族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时就发生民族间的战争。同一民族当中，也有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并激发出起义、分裂、割据的战争。矛盾的对立，使统一中包含着分裂与割据的因素，并且实际上造成两度大分裂

；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相互不可分割的联系，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并且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统一不断扩大和得到巩固，各民族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统一的中国和平相处，各自得到了发展。

现在分为：统一、大分裂、南北地区性的多民族统一与南北朝对峙三种情况，看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统一：先秦是统一多民族中国起源与孕育阶段，夏、商、周都具有诸侯共生的性质，其统一与秦汉中央集权不同，仍当归入统一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约1500年为统一时期。

秦、汉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肇端时期，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是中国历史第一次中央集权制大统一的时期。

隋、唐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时期，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以后，中晚唐虽然有河北藩镇割据，总体上还是艰难地维持了唐朝的统一。隋、唐从581年到907年共326年。

元、明、清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确立的时期，从公元1260年元世祖即位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共650年。

以上三次大统一，都有政权嬗替、民族间、阶级间、各政治集团间的战争，总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时期。如果以夏代到清末4000年王朝史计算，以上统一时期共有2970年左右，约占中国古代历史年代的3/4；如果以秦皇统一后各王朝的历史计算，2100年中，统一时期共约1370年，占2/3弱；如果加上西晋（265~316）、北宋（960~1127）的200余年，约占2/3强。

大分裂：春秋（前770~前477）、战国（前476~前222），西周灭亡，共主统一的局面分裂，前后有448年，诸侯争霸、兼并，割据混战。

三国（220~225），虽然晋灭东吴在公元28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西晋建立起为一个历史时期已基本结束，大分裂前后半个世纪左右，实际上从黄巾起义失败以后，军阀混战，到西晋建立前有80年左右的大分裂时期。

五代十国（907~960）前后53年，这个时期从镇压黄巢起义开始军阀割据，到荆南、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南北割据政权最后消灭，前后也有80年左右的分裂混战。

以上从夏代到辛亥革命以前约4000年中，完全大分裂的时期约有650年左右，仅占中国古代年代总数的15%左右。如果以秦始皇统一以后2100年计算，则大约分裂的时期共约100年，仅占5%左右；再加上汉末、唐末军阀混战与“五胡十六国”的百数十年，则也是15%左右。

南北地区性统一：东晋、“五胡十六国”之后，从公元420~580的160年间，南北多民族地区性统一，形成分别由汉人和少数民族南北两王朝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

第一次南北朝。北宋统一南北诸王国，与辽对峙，以及南宋与金对峙，从公元960~1034前后274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南北分别由汉人与少数民族建立对峙的时期。两次南北朝共有434年，约占夏到清4000余年的10%强，占秦到清2100年的20%强。

从统一的范围与各民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统一程度看，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巩固。近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各民族从自发向自觉大联合发展，在最艰苦严峻的历史条件下，保卫了祖国的统一和疆域基本完整，争取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所以，中国广大的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开发、共同缔造、共同保卫的，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是中华民族共同缔造的，这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客观的历史事实，不是任何人主观可以臆造或能够加以抹煞的。

(三) 从秦汉至清代中央集权制度以汉文化为基础，同时实行农牧民族文化的交融结合；对边疆民族，实行在统一中国内“因俗而治”。

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是秦汉奠定的，以后历代王朝在基本继承中有所因革省益；隋唐在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明清两代发展到极端，大权集于专制君主一身。这个制度从秦汉至清代一脉相承，以汉文化为基础，同时贯穿着农牧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结合。这种基本精神，在历代王朝制度体系各个层面都有一定的反映。客观地研究中国农牧民族关系发展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能不认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整个古代的形成发展，本质上是以华夏/汉族为主体的农牧两大类型民族的统一；以华夏/汉文化为主干，农牧两大类型文化的撞击、结合与交融；以汉地耕作农业经济为基础，农牧两大类型经济的相互依赖与相互补充。没有这些客观的深层次不可分割的联系，任何单纯依靠军事力量维持的统一都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在完全分裂以后又重新达到更高度的统一，以致于完全得到巩固与确立。

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制度和政策，历代王朝有基本的继承性也有各自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制度与政策，是封建压迫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民族压迫制度，造成了民族间的歧视与隔阂，但与殖民制度和强迫同化有根本的区别。总的原则在《礼记·王制》中已提出，即“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各民族保持其固有的制度、宗教、习俗，实行“因俗而治”。各民族的统治阶级，不因接受王朝封号而丧失权力，反而可以借助朝廷的封敕加强其统治地位，各族的习俗与宗教信仰等也可以兼容并存。这种制度，一方面保障了中国的统一，各民族都是中国人的认同观念和民族地区既是各民族的家园，也是中国统一版图的概念，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各民族传统的延续与各自有特点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各民族中有多种社会制度、多种宗教、多样的习俗等等，兼容并存和平交往的格局。这种统一与多元兼容，是中国的统一能不断得到发展的重要原

因之一。当然这种兼容并存，是建立在各民族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与当代中国所推行的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区域自治的制度有本质的区别。

(四) 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问题有历史渊源的联系，更有本质的区别，既要重视其历史渊源的联系，更要区别其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影响全局的重要问题之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中国由多民族形成统一的国家，经历了从秦汉至清代2000余年不断发展巩固的过程。2100余年间，统一、分裂交替出现，各民族不同政权间相互的封贡、交聘、盟誓、和亲、战争，不同时期各不相同。无论这些政权之间当时以何种关系相处，互相以何种称谓交往，都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过程中的问题，各民族各种政权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当时可能是互为敌国，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结局看则没有超出中国历史的范畴。自1840年至1949年，虽然经历了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也无论当时是否已形成民族自觉意识，在100余年中，中国的民族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中华民族联合成整体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以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反抗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以求各兄弟民族一律平等，这是中华民族反对和废除封建压迫制度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民主革命总任务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各兄弟民族实现了平等、团结、共同进步，建立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各兄弟民族互相尊重、共同奋斗、相互支援、团结协作，以争取协调平衡的发展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在现代化基础上中华民族的振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的新发展，也是对世界和平与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

文 献

陈连开

1989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文化史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41页。

1994 《中国民族文化的特点》，《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57-59页。

费孝通

1989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第6-33页。